



民族风采

湘西的神秘

□聂元松(土家族)/图文

我是湘西的丫头，年幼时便喜欢跟在外婆身后，赶着看跳花灯、耍狮子、舞龙灯、唱土戏等一切表现人间悲喜的表演。五颜六色的脂粉，形象怪诞的面具下隐藏着太多神秘，小小的丫头在被深深吸引的同时，感到一丝莫名的心惧。后来明白，当年的感受是对先人文化密码的一种敬畏。

这敬畏一直流淌在我的血液里，如潮汐时时冲击着我的心灵。我当然明白，湘西之厚重神秘，我终生一生都读不透，而我却无法抑制血脉的涌动，于是写下了一些感性的文字，权作个人追逐湘西文化的心路历程之记录和对我养我的这一方水土的报恩。在行走湘西民间的过程中，我拍下了一些物象和人事，他们生动而鲜活，堪称隐没在湘西山野的历史遗存和民间表情。愿这些照片，能让湘西大山之外的人们更直观地了解关于湘西的文化叙事。

我镜头下的人和事、风景与民俗，无不诠释着湘西的历史文化。它们如散落在乡野的文明碎片，让我有幸拾得、珍藏。在漫长的岁月里，我可以不时地翻出来欣赏，时光一天天老去，而它们渐渐成为了我不老的故人，弥久愈新，越陈越香……

是湘西这片古老神奇的土地养育了我、造就了我。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我而言，湘西不仅赋予我生命，更缔造了我的诗心。我的血管里流淌着祖先的血液，我的心房中搏动着湘西的脉搏，没有她就没有我。令我惶恐的是，以我的才智和能力，远不能悟透湘西、曲尽湘西，只能以自己微弱的力量做一点努力，以此慰藉一个赤子的情怀。



童年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季节，是一个梦的故乡。在那个时候，我非常喜欢看有关战斗的小说，看着看着，在按捺不住的时候就跑出去。在皎洁的月光下，我的“队伍”集合了，因为我是“司令”，身边就自然地有一个“警卫”。他比我大两岁，平时总是紧紧跟在我的身旁，形影不离，言听计从。由于我们自产的“武器”先进，又指挥有方，就常常打胜仗。那时就想，如果真的在战争年代，我真可能就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将军。

慢慢地，岁月洗去了我的天真烂漫，使我深知战争的极端残酷。一幕幕影像如浮云般在我脑际一遍遍闪现：一个个红军战士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遭遇敌人的枪炮而牺牲，在爬雪山过草地时冻饿而死，而他们相当一部分只是十多岁的孩子；东北抗联的战士也多是没成年的孩子，为了打败日本鬼子，在林海雪原中受冻挨饿，忍受着令人难以想象的痛苦，最后倒在敌人罪恶的枪口下……

后来，我成为一名作家，具体地说，是一名赫哲族的作家。我申报了2013年中国作协“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的创作计划，到黑龙江饶河县的乌苏里江畔深入生活，采访创作反映抗日斗争题材的文学作品。

一首著名的《乌苏里船歌》不仅让更多人知道赫哲族，也让他们知晓中国东北有条与俄罗斯一江之隔的乌苏里江。北国小城饶河就坐落在这世界闻名的乌苏里江畔。在这乌苏里江北岸，在广阔的平原上绵延着起伏如浪的群山，这就是完达山余脉南沿的那丹哈达岭。这里不仅是风景壮阔秀丽的风水宝地，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是赫哲族人民与抗联组成的抗日游击队打游击战的重要战略要地。其中，饶河县更是黑龙江省的革命老区。1931年成立饶河中心县委，是东北抗联七军所在地和发源地。革命先辈历经14年的抗日斗争，把宝贵的鲜血和生命献给了这片热土……

2013年6月25日，我来到了饶河县。位于饶河县饶河镇小南山主峰下的缓坡处矗立着一座饶河抗日游击队纪念碑。碑身顶端是一位高大的抗联战士持枪行进的雕像。我被这座雕像深深地吸引，战士洒脱的英姿、从容的行态，还有那严峻、深邃的眼神都让人难忘。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全凝固在他那目光的一瞬之间。转到碑体的背面，有记述先烈们奋斗史的碑文。其中一段写到：“在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持下，队伍迅速壮

大，由抗日联军四军四团，进而为二师，为七军，凡二三千名健儿，或阵前，或敌后，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前仆后继，足迹遍及那丹之岭，碧血荐于三江之野。”

随后，我到饶河县委宣传部报到，见到了县委党史办副主任何玉林。我们俩一见如故，原来他还是我的同族，而且还是以前没见过面的亲属。他热情地带我到好多抗联战斗过的地方寻访知情人，把他们召集在一起座谈。他们一听说我要了解赫哲族抗日故事，都非常热情主动地为我讲述他们知道的。

那丹哈达岭中有座山叫大顶子山。大顶子山是当地有名

害。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抗联七军决定拔掉这颗“钉子”。1937年3月6日，准备由军长陈荣久主持召开一个特别会议，即召集各山林队首领在天津班召开抗日会议，组成统一抗日战线，并具体部署联合攻打特务工作班的作战计划。不想，派往去山林队通知开会的人是打进我内部的一名潜伏特务，他在半路就向敌人告了密。

在此之前的3月4日，参谋长崔石泉率亲率100多名抗联战士与红枪会一起奇袭日伪西林子警察队和特务工作班，但此次行动事先已被敌人获知。敌人有了准备，防守严密，火力很

猛，致使攻打受阻。激战了一天多后，进攻仍没有进展，如果强攻必然损失很大。崔石泉当机立断，把部队撤出与天津班的陈军长会合。此时，陈荣久正与各抗日山林队首领开会。对于此突发情况，军领导准确判断敌人很可能疯狂追来，于是迅速做好了伏击敌人的战斗准备。抗日联军和各山林队一起迅速赶往天津班沟口屏岭山东端沿路附近的几个小山头埋伏，设伏四道伏击圈。这里是西林子通往暴马子顶的必经之路，而且有伏击敌人的有利地形。果然，日本参事官大隈久雄得到特务传来的情报后，立即聚集270多名日伪军奔向饶河然后又通过西林子疯狂向天津班扑来。

3月6日，侦察战士来报，鬼子即将接近埋伏圈。不一会，10余匹马爬犁疾驶而来，很快通过了第一道埋伏圈，埋伏了一天一夜的抗联战士和山林抗日勇士们终于等到了战斗时刻。当第一个马爬犁来到第三个埋伏圈时，只听陈荣久一声令下，道路两旁山包上的150多名抗日勇士的步枪、机枪、手枪一齐开火，同时一颗颗手榴弹带着仇恨的怒火向敌人飞去。

突然而来的枪声、爆炸声惊炸了套马，顿时，没死的惊马狂奔撞到树上，马倒爬犁翻，有的鬼子被掀翻在雪地上，鬼哭狼嚎，一片混乱。有没被打死的鬼子和伪军举枪顽抗。赶马爬犁的老板子此时已吓傻了，成了鬼子的盾牌，当他们听到抗日联军高喊“老板子快趴下”的声音后才缓过神来赶紧趴下。

接着，抗日勇士们又是一波齐射，敌人又倒下一大片。在开始的混乱中，当狡猾的大隈久雄被马爬犁掀翻后，他顺势躲在一棵大树后号叫着指挥伪军还击，鬼子向山上冲，机枪也凶猛地向上扫射。当鬼子冲到离我军20多米时，被我军一猛猛烈射击，手榴弹也在敌群中开花，眨眼间日伪军血肉横飞、魂飞魄散，剩下没死的连滚带爬逃回山下。此时的大隈久雄更疯狂地挥舞着指挥刀驱赶着日伪军向山上冲。此时此刻，他那握刀的手被我军神枪手击中，亡命的大隈久雄用绷带缠上右手，用左手握刀随日伪军号叫着又往山上冲，当他冲到离抗联队伍10多米时，一连连长王振华向其连射5枪使其毙命。但是，王振华跃起扫射时完全暴露了身体，不幸中弹牺牲。

这时，冲上来的鬼子又被我军打下山去，阵地前的雪地上，敌人死伤一片。正当抗日联军要乘胜追击，一举将残敌歼灭时，背后响起了一片枪声。原来，敌军有100多人正从背后悄悄包抄上来，而正面山下的日伪军一看增援来，就又折回来反扑，致使抗联队伍腹背受敌。军长陈荣久指挥战士两面迎击的同时，还指挥神枪手多次打掉对我军最具威胁的机枪。当他奋不顾身率领战士们去抢夺敌人的机枪时，不幸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部，当场壮烈牺牲，年仅34岁。军长的牺牲更加激怒了战士们，他们把子弹像一阵飓风一样横扫向敌人，但敌众我寡，抗联的战士们背起负伤的队友趁着黑夜突围，战士们边打边向密林深处撤去最后摆脱了追敌，回到了密营。此次战斗共打死大隈久雄等数十名日伪军，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抗日联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共有7名勇士牺牲，他们把一腔青春的热血洒在了他们所热爱的土地上。

在我深入采访的这段日子里，大顶子山上开满了灿烂如火、鲜艳圣洁的杜鹃花。徜徉在这如海的花丛中，抗日勇士勇猛的战斗身影时时幻化闪现在我的眼前，使我思绪万千。如今我们的生活像这花朵一样美好，但我知道，这是由抗日勇士的鲜血浇灌出来的。

踏上昔日硝烟弥漫的战场

□孙玉民(赫哲族)

的“圣山”(原名伊克堆垒山，赫哲族语为“老牛顶子”之意)，它的地势非常险要，是当年抗联七军的根据地。在大顶子山发生过多次战役，其中，“天津班战役”最为著名。

1936年11月，奉吉东特委指示，抗联成立七军，陈荣久任军长，下设三个师，一师长由陈荣久兼，二师长为李学福，三师长为景乐亭，参谋长为崔石泉。七军成立后，与日伪军针锋相对，迅疾袭击企图进剿我抗日联军的日本侵略者，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但日伪、特务、汉奸仗仗占区的势力，频繁猖狂活动，不仅阻挠破坏抗日联军的抗日活动，而且给饶河百姓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在饶河西林子处有一个日伪特务工作班，全称是“饶河地方治安工作班”。他们刚从长春转过来不久就迫不及待地迫害抗日地下组织，致使抗联多位领导人和优秀地下党员被捕，很多家属也一并遇难。

这些经过日本特务机关专门训练的特务，还渗透到抗联队伍中进行瓦解和策反活动，使一些思想不坚定的人变节投敌。投敌者为敌人搜寻抗联行踪，给抗日队伍造成极大的危